

ZHONG GUO DANG DAI WEN XUE SHI

# 中国当代文学史

1

福建人民出版社

# 中 国 当 代 文 学 史

1

二十二院校编写组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1 1/2印张 262千字

1980年5月第1版

198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6,500

统一书号：10173·152 定价：1.05元

**编著单位（以笔划为序）：**

山东大学	山东师范学院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师范学院	上海教育学院	四川大学
辽宁大学	包头师范专科学校	甘肃师范大学
江苏师范学院	安徽大学	安徽师范大学
扬州师范学院	杭州大学	复旦大学
南京师范学院	浙江师范学院	徐州师范学院
厦门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
新疆大学		新疆师范大学

## 前　　言

为适应高等学校中文系教学的急需，我们编了这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全书约八十余万字，分上、中、下三册出版。

这部书是按照教材的要求编写的。为了眉目清晰，讲授方便，我们从三十年来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学事业发展的实际状况出发，把当代文学的历史初步划为四段，每段为一编，即一九四九年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到一九五六年为第一编，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五年为第二编，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为第三编，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九年九月为第四编。全书以“绪论”开篇，总论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重大成就和主要经验教训。每编第一章的“导言”，简述本时期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以便读者了解文学运动、文学创作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除“毛泽东同志诗词”、“郭沫若”两个专章和各编第一章“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斗争”外，其余各章，均有“概述”一节，简括介绍各时期文艺批评和各种体裁文学创作的概貌。关于作家，一般以其代表性作品问世的时间作为排列于某一时期的依据，此前和此后的作品则采取补叙和追叙的办法。重要作家都有创作道路部分，其他作家，则根据在文学史上所占地位的不同，或对生平及其创作发展的历史线索作简要介绍，或只介绍生平，或只具名，不作介绍。

编写本书，历时一年。一九七八年九月，由上海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主持，在上海召开会议，拟定大纲并作了编写分工，

今年四月，由扬州师范学院主持，在扬州召开了初稿讨论会；六月，由山东大学主持，在济南召开了定稿会；八月一日起，由复旦大学、福建人民出版社主持，在上海召开编委会议，作最后的修改审定工作。上述历次会议，都是在主持单位院校党委、中文系总支的领导和关怀下进行的。上海师范大学汤逸中、扬州师范学院吉明学等同志，为会议的召开，分别作了大量组织工作。安徽大学李焕仁同志在协作院校修改本书大纲、讨论初稿、二稿的过程中，做了大量的工作。

参加协作的院校和执笔同志是（以校名笔划为序）：山东大学吴开晋、牛运清、庞守英，山东师范学院刘金镛、冯光廉等，上海师范大学王训昭、方仁念，上海师范学院李学娴，上海教育学院杜玉华、黄宏真，四川大学黄莉如、陆文璧，辽宁大学仲维纲、赵家风、徐国纶等，包头师范专科学校丁尔纲、郭振华、赵锡钧，甘肃师范大学季成家，江苏师范学院浦伯良、廖慧予、卜仲康，安徽大学李焕仁，安徽师范大学刘普林、贾佑吉，扬州师范学院吉明学、石明辉、匡启镛，杭州大学何寅泰，复旦大学陆士清、唐金海，南京师范学院鲍善本，浙江师范学院金汉、金葵、杨建新，徐州师范学院韩云彤，厦门大学苏景昭，福建师范大学陈纾、王玉芝，新疆大学雷茂奎，新疆师范大学胡剑。

各协作单位经过协商，推选产生了编委会和编委会负责人；在统稿过程中，编委会又根据工作需要，确定了责任编辑。编委会组成如下：

责任编辑：陆士清；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方仁念、牛运清、仲维纲、何寅泰、李焕仁、季成家、陈纾、陆士清、胡剑、浦伯良、唐金海。

江苏师范学院廖慧予同志参加了本书第一编部分统稿工

作。

福建人民出版社对本书的编写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协助；该社编辑管权同志参加了扬州、济南会议和编委会议，仔细阅读了历次书稿并提出了详细修改意见，对本书的修改完成起了重要作用。

在上海、扬州、济南会议期间，上海、江苏、山东宣传部门的负责同志、文联和作协的负责同志，曾经分别出席了有关会议并讲了话；安徽省文联的负责同志出席了扬州会议并讲了话；全国和上海、江苏、山东的部分新闻、出版、文艺和科研单位的代表列席了会议，全国几十所兄弟院校的代表列席了会议，提了许多宝贵意见；许多作家、批评家也对本书的编写工作给了热情赞助和支持。在此，对上述所有单位和同志，我们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在编写本书过程中，我们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三十年来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史和重大成就，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叙述和尽可能准确的评价分析。但是，一方面，由于我国当代文学所经历的，是一条光辉而又曲折的道路，某些重大的历史问题一时尚难作出结论，许多重要理论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和澄清；另一方面，也由于时间仓促，我们水平有限，因而这部书稿必不可免地存在着许多缺点和错误。我们是作为一种尝试，把它奉献给读者的。我们热望得到作家、批评家和其他文艺工作者的批评指正，得到高等院校中文系师生和其他读者的批评指正。我们愿意在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帮助下，经过一段时间教学实践的检验，有机会作进一步修订，以不断提高这部书稿的质量。

编 著 者

一九七九年九月三十日

# 目 录

绪论	1
一 当代文学运动的历史回顾	2
二 当代文学运动的巨大成就	10
三 当代文学运动的基本经验	21
第一编 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的文学	
第一章 文艺运动和文艺思想斗争	33
导言	33
第一节 第一次文代大会的召开	35
第二节 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文艺界的整风	42
第三节 第二次文代大会的召开	48
第四节 对《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	52
第五节 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58
第六节 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和全国青年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	62
本章小结	65
第二章 本时期的文艺批评	68
第一节 概述	68
第二节 关于若干理论问题的讨论	70

第三节	何其芳的文艺批评著	80
第四节	冯雪峰的文艺批评著	87
第五节	秦兆阳、陈涌、巴人等的文艺批评著	96
<b>第三章</b>	<b>本时期的小说</b>	<b>104</b>
第一节	概述	104
第二节	周立波及其《暴风骤雨》	111
第三节	丁玲及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124
第四节	赵树理及其《三里湾》	140
第五节	杜鹏程及其《保卫延安》	158
第六节	沙汀和艾芜的小说	174
第七节	刘知侠、杨朔、孙犁等的小说	184
第八节	峻青的短篇小说	192
第九节	王愿坚的短篇小说	200
第十节	王蒙、刘宾雁的短篇小说	207
第十一节	玛拉沁夫等兄弟民族作家的小说	217
第十二节	张天翼、严文井等的儿童文学创作	222
<b>第四章</b>	<b>本时期的散文</b>	<b>233</b>
第一节	概述	233
第二节	巴金的散文	241
第三节	魏巍的散文	248
第四节	其他散文作家的作品	256
第五节	高玉宝、吴运铎等的传记文学	264
<b>第五章</b>	<b>本时期的诗歌</b>	<b>271</b>
第一节	概述	271
第二节	闻捷的诗歌	278
第三节	艾青、田间、阮章竞、王老九的诗歌创作	289
第四节	梁上泉、公刘、邵燕祥、未央等的诗歌创作	299

第五节	《阿诗玛》等兄弟民族的民间诗歌	308
第六章	本时期的戏剧、电影文学	317
第一节	概述	317
第二节	老舍及其《龙须沟》	324
第三节	夏衍的话剧、电影创作	335
第四节	《万水千山》、《董存瑞》等话剧和 电影文学剧本	345
第五节	《十五贯》等戏曲改革的成就	353

## 绪 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三十年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可是，在这三十年里，我们伟大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亿万中国人民，在古老文明的中国大地上，演出了前所未有的英勇壮烈的变革现实的活剧，在胜利完成了伟大的民主改革以后，又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把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改造成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文学运动，也以一九四九年七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为起点，开始了伟大而艰巨的历程。中国当代文学运动，是“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学运动的延续和发展。它担当着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光荣任务。它所服务的对象，也随着革命的发展而更加扩大、更加广泛。三十年来，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和扩大了自己的队伍，统一了前进的方向，在斗争中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学。广大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列主义，学习社会，学习艺术技巧，跟广大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努力描绘人民新的生活和斗争、思想和感情，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塑造了不少生动的具有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人物形象，为培养社会主

义新人，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的文化需要，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三十年来，当代文学运动沿着毛泽东同志所指引的方向前进，经历了曲折的道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特别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中国，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肆虐的时候，社会主义文学运动，经受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现在，打倒了“四人帮”，随着全国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社会主义文学运动也跨进了新的历史阶段。为了深刻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促进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使文学更好地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服务，有必要对三十年来的社会主义文学运动作出科学的总结。这个任务，已历史地落到了各级文艺领导部门和全体文艺战士的肩上。我们编写这部当代文学史，目的之一，也是想在这方面作一个粗浅的尝试。下面，我们先就当代文学运动中的几个重大问题，作一初步的概括的论述。

## 一、当代文学运动的历史回顾

三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运动，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在这个阶段，社会主义文学运动，一方面要创造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用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崇高思想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前进。另一方面要扫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学艺术的糟粕，破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影响。当时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对《红楼梦》研究中胡适派主观唯心论的批

判，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批判等，都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的斗争。这样的斗争，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初期，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思想意识还根深蒂固地存在的时候，在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这场极为深刻的社会大变革，要求无产阶级思想广泛地占领阵地并且树立优势的时候，不仅是必要的、重要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为政治运动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展开，这就产生了某些严重的消极后果。然而，总的看来，这些斗争的胜利，进一步确立了无产阶级思想在文艺领域内的领导地位，使文艺为最广大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深入人心。文艺工作者由于分清了思想是非，划清了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界限，从而提高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自觉性。这个斗争为社会主义文艺建设打扫了基地，社会主义文艺在斗争中获得了初步的发展。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样一些斗争的胜利，也为对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着巨大意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创造了条件。

第二个阶段，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六年。这个阶段，由于前一阶段在队伍上和创作上的充分准备，由于党的正确的文艺方针和政策得到了一定的贯彻，因而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局面，特别是反映民主革命时期斗争生活的作品和歌颂党和社会主义的作品，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各种文学样式，无论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电影文学、儿童文学、民间文学，都获得了丰收。群众文艺、业余创作和文艺批评也有了发展。三十年来，大部分优秀的小说、诗歌、戏剧和电影文学都是在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六年前这个时期产生的。

但是，这个时期，诚如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我们在巨大的

胜利面前开始不谨慎了。”五十年代后期，在政治斗争中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违背了客观规律，犯了“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接着又在党内不适当当地开展了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种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上“左”的错误，也突出地反映在文艺工作上。

首先，在文艺战线上，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现象。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再次深刻阐明了促进科学进步和艺术发展的正确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毛泽东同志这个讲话的基本精神和双百方针，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认真贯彻。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和此后的批判修正主义思潮、批判资产阶级学术观点、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等等政治运动中，扩大了打击面，把一大批革命的作家、文艺理论家打成了右派分子或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一批好的或者比较好的文艺作品打成了毒草；把许多正确的或者可以深入探讨的理论观点打成了修正主义文艺观点。

第二，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了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实用主义的理解。把文艺为政治服务，变成了文艺等乎政治，文艺图解政治；把政治标准第一变成了政治标准唯一；把为政治服务变成了为某些具体的中心工作服务，甚至出现了“写中心，画中心，唱中心”的口号，把文学作品当作宣传某项具体政策的挂图，把作品中的人物当作某种思想的简单的传声筒。

与此相关联的是，对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理解得极为狭隘，把一切有利于人民群众正当的休息、娱乐，有利于人民增加科学文化知识和认识生活的文艺作品都排斥在这种教育作用之外；在风格上也只要求所谓豪迈的语言，雄壮的调子，鲜明的色彩，稍有不同，就被说成缺乏时代精神，或

被目为资产阶级情趣。

第三，在对文艺运动的指导下，不尊重艺术规律，无视艺术民主，简单粗暴。有时还在最富有独创性的文学创作领域里，大搞所谓的群众运动，公开号召人人作诗，人人写戏，人人写小说，造成了不少消极的后果。

第四，在文艺批评中，粗暴和武断的现象有所发展，甚至产生了姚文元那样的恶棍，动辄上纲上线，把文艺评论变成了政治判决，棒杀了许多作家作品。

所有这些“左”的错误，使很多同志遭到了不应有的打击，错误地批判了一些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文艺观点和文艺作品，伤害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其中包括一些有才能、有作为、勇于探索的文艺工作者，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文艺界刚出现的生气勃勃的景象遭到了挫折，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正如陈毅同志所说：“形势很严重，也许这是我过分估计，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sup>①</sup>这种形势引起了党中央的关注。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周恩来同志发表了《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讲话。接着在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又发表了《在文艺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周恩来同志在《讲话》中，从文学艺术的特点、文艺创作的规律和党如何领导文艺等七个方面，作了深刻的阐述。他大声疾呼，要尊重艺术规律，发扬艺术民主，坚定地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周恩来同志这个讲话，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对解放后的文艺运动进行了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九六二年一月，在七千

<sup>①</sup>陈毅：《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二期。

人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也说：“同志们啦，你们要相信过去三年有时候我们是做蠢事呀！我们是很蠢的呀！”<sup>①</sup>接着，周恩来和陈毅同志在广州会议上又就知识分子政策、艺术民主、文艺创作以及党的政治工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了讲话，对“左”的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一九六三年四月，中央又下发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八条》），这些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可是我们一些担任文艺领导工作的同志，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背景，头脑中的“左”的思想没有得到克服，特别是由于那个所谓“理论权威”和江青等的破坏干扰，周恩来同志的讲话精神和《文艺八条》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不久，在那个所谓“理论权威”和江青的阴谋策划之下，又把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家斗争生活的小说《刘志丹》打成反党小说。而后，他们一方面插手京剧现代戏的汇演，把自己打扮成演现代戏的倡导者；一方面打着反修的旗号，对社会主义文艺运动下毒手。一九六三年大批“有鬼无害论”，一九六四年开始对一批优秀影片进行围剿，为他们全面实行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进行预演。社会主义文艺运动面临着一场灾难。

第三个阶段，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文艺运动的领导权被林彪、“四人帮”篡夺。林彪、“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活动，是从篡夺文艺领导权开始的。一九六五年底，姚文元抛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是林彪、江青一伙对革命文艺进行反革命大扫荡的突破口。一九六六年二月，江青与林彪勾结，并伙同张春桥、姚文元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他们实行全面夺权的信号，也是他们推行极

<sup>①</sup> 转引自陈毅《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二期。

左路线、实行“全面专政”的反革命纲领。

林彪、“四人帮”把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污蔑为“黑线专政”，把解放后十七年中出版的优秀文艺作品，几乎全部打成“毒草”，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学遗产扫荡殆尽。把几十年来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而蜚声中外的文学家、艺术家和革命文艺工作的组织者、领导者统统打成“黑线人物”，进行围攻、批斗甚至投进监狱，许多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被迫害致残，或含恨身亡。林彪、“四人帮”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使革命文艺事业遭到空前浩劫，革命文艺工作者遭到残酷的迫害。

与此同时，“四人帮”一方面采取极为卑劣的手法，把许多文艺工作者辛勤创作出来的革命现代京剧作品，进行一点捉襟见肘的修补，变成所谓江青“呕心沥血”创造出来的“样板戏”，另方面，又打着“写文化大革命”和“写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旗号，以《三突出》、《五好衬托》为模式，来丑化我们党，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丑化革命干部，为他们反革命夺权制造舆论。《初春的早晨》、《金钟长鸣》，就是这一类毒草的代表作。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四人帮”加快阴谋篡党夺权的步伐。华国锋同志被确定为国务院总理并主持中央工作后，“四人帮”公然抛出了“老干部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同时提出“发誓走资派斗争”的反动口号，于是《反击》、《欢腾的小浪河》、《盛大的节日》、《千秋业》等阴谋文艺作品纷纷出笼。这些作品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极尽污蔑攻击之能事，为“四人帮”变天、上台制造反革命舆论。但是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富于戏剧性的。“四人帮”从文艺战线开刀，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而人民则以战斗的诗篇，宣告了“四人帮”的末日。

来临。

一九七六年丙辰清明爆发的“四五”运动，是划破黑夜的一道闪电，是全国人民跟“四人帮”进行决战的号角。作为“四五”运动的匕首和投枪的天安门诗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与万恶的“四人帮”长期斗争的产物，是觉醒并且成熟了的人民用血泪写成的千古绝唱，它永远鼓舞着人民战斗前进。

第四个阶段，一九七六年十月到一九七九年九月。粉碎了“四人帮”，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社会主义文学运动也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经过深入的揭批斗争，粉碎了“四人帮”在文艺战线上的帮派势力，夺回了文艺事业的领导权，推倒了“文艺黑线专政论”，社会主义文艺也得到了复苏和发展。

一九七八年五月，《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闪耀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光芒的文章，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个讨论，对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起来向前看的方针，进一步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正是在实事求是这一马列主义思想路线指引下，文艺战线终于突破林彪、“四人帮”的思想禁锢，根据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中文艺运动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推倒了所谓的“文艺黑线”论，使文艺界一批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昭雪。这是文艺战线上批判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拨乱反正的一次重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把粉碎“四人帮”、文艺得解放的形势在更加深广的意义上向前推进了。